

离合变化终须有 淘尽泥沙显精金

——学习鲁迅关于“同路人”的论述

史家健 常崇宜

鲁迅的一生，跨越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历史时期。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他始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①，坚定地沿着党指引的方向，随着时代的潮流，奋勇前进。同时，他也目睹同一营垒的“离合变化”②，“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③。对革命队伍的分化，出现“同路人”这一历史现象，鲁迅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了精辟的论述。今天，重读鲁迅的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抓住要害，从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批判他的反动本质；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走资派还在走”这一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的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牢固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时同道的伴侣”

革命队伍中的“同路人”，都不能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在一定条件下，能为革命做些工作，但随着革命的深入，总是要从革命队伍中分化出去，走向自己的反面。鲁迅对此是有深刻记忆的。在《〈竖琴〉前记》中，他指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刘半农是“五四”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鲁迅勾画了他一生前后两个时期的事略，揭示了“同路人”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这一历史现象。“五四”时期，刘半农曾和鲁迅并肩协力，参加编辑《新青年》杂志，提倡白话文，鼓吹“文学革命”，对封建余孽进行过痛快淋漓的抨击。鲁迅称赞他当时是“一个战士”，“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④。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向前推进，刘半农却止步了。胡适之流骂他“浅”，他竟伤心自惭，随后便听从胡适“踱进研究室”的呼吁，飘洋去国，留学巴黎，埋首音韵，穷钞古书，做起“学问”来了。他在故纸堆里讨了几年生活，戴着“文学博士”帽回国，终于高升，挤进他孜孜以求的“学者”、“教授”之林。于是这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⑤，爬了上去，身居要津，渐渐走向新文化运动的反面，陷入复古倒退的泥淖。他在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办的《论语》、《人间世》等

刊物上搞“帮闲”文学，时而写《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之类的烂古文；时而作《桐花芝豆堂诗集》之类的打油诗。甚至还步胡适的后尘，摆出大学教授的臭架子，借中学生考大学时在试卷上写错一个字，得意洋洋地做诗，“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⑥，把自己曾为之战斗过的白话文踏在脚下。先前，鲁迅在“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还引刘半农为“好伙伴”⑦，但在长期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一个随着历史潮流继续前进，终于还是战士，一个却落荒而去。到了后来，他们再相见时，“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⑧。鲁迅对这个“一时同道的伴侣”先后的变化，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曾形象而尖锐地指出：“原先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同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康有为、严复、章太炎也莫不如此。康有为写过《大同书》，曾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严复译过《天演论》，在思想界风靡一时；章太炎鼓吹“种族革命”，俨然一代领袖。然而，曾几何时，这些原来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到后来，“康有为永远定为复辟的祖师”，袁世凯窃国称帝要严复上劝进表，孙传芳请章太炎行尊孔复古的投壶之礼，都统统堕落为“拉车屁股向后”的角色了。

更为可贵的是，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苏联十月革命后的阶级斗争现实，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一九三〇年，他译完苏联雅各武莱夫的小说《十月》，在《后记》中断言：“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今天，邓小平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走资派、复辟派，他所实际走过的道路，完全证实了鲁迅的论断。“同路人”只能是“一时同道的伴侣”这一历史现象，是不同历史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反映。纵然在革命队伍的进程中，会发生“离合变化”，但“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⑨这是鲁迅的结论，是革命的辩证法。我们党正是在斗争中不断清除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和阶级异己分子，领导广大革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终极目的的不同”

革命是无止境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充分了解历史的远景，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并在战斗中不断改造自己，才能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永葆革命青春。鲁迅正是从阶级立场、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上，考察分析了“同路人”不能坚持革命到底的原因。他指出在革命兴起时投入革命潮流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和世界观，“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正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⑩，所以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便有人退伍、落荒、颓唐，甚至叛变。章太炎逝世以后，鲁迅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篇杂文。在悼念之外，他肯定了章太炎早年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战士在历史上所作的功

绩，指出：“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⑪当时，章太炎的奋斗目标明确，战斗得意志旺盛，确是个生气勃勃，所向披靡的革命家。但是，他的立场、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鲁迅指出章太炎的理想只在“排满”，待到“民国元年革命以后，先生的所志已达”^⑫，便竭力主张“革命党消”，到站下车了。不前进，必倒退；不革命，必复辟。章太炎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立派、复古派。这是他由拉车前进到拉车后退的深刻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后来，他“参与投壶，接受馈赠”，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效法孔老二收徒传“经”，“身衣学术之华裘，粹然成为儒宗”^⑬，以及在蒋介石重金收买下，高唱起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等复古倒退之举，就不能不受到鲁迅和其他革命者的严厉批判。刘半农也是这样，鲁迅曾指出过“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太多”^⑭，他原来的思想基础就不好，旧性颇深。在“五四”时期，他一面“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一面却又企慕当个“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才子。后者是与鲁迅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大相径庭的。虽然当时鲁迅帮助、教育过他，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刘半农不能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旧性又如沉滓样泛起，最后还是与鲁迅分道扬镳，从“五四”文化新军中分化出来。鲁迅剖析章太炎、刘半农所走过的道路启示我们：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或怀着某种个人的动机参加革命，在革命深入时，仍死抱住旧的一套不放；或执着于个人目的，不使自己的立场、世界观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历史所淘汰。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工农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辨别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同路人”之所以不能将革命坚持进行到底，除了为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之外，也是和他们堕入历史唯心论，脱离工农群众分不开的。“既离民众，渐入颓唐”^⑮，这是鲁迅总结章太炎的一生得出的另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也是所有“同路人”的又一共同特点。鲁迅将章太炎与高尔基作过对比。他指出，高尔基“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所不通”^⑯。正因为高尔基与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因此，始终是“战斗的作家”。他“生受崇敬，死备哀荣”^⑰，就是很自然的了。而章太炎“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⑱这就导致他在个人小天地里，昏昏然以“活的纯正的先贤”^⑲自居，甚至狂妄地宣称，只有他才能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充当调和一切新旧学说的护法神。其实，他这时的所作所为，正是置身于反动阵营反对工农。他建立的章氏“国学”体系，不外是他早先曾批判过的孔孟破烂。在马列主义已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情况下，鼓吹这些破烂，实际上是在绞杀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与马列主义为敌。他

逝世后，一九三六年，上海的官绅为章太炎开追悼会，但“小民”不到，“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⑳。这很清楚地说明后期的章太炎“为大多数所忘却”^㉑，只是官绅的偶像罢了。鲁迅洞察“同路人”的这一特点，在后期许多杂文中，发表了不少类似的见解。一九二七年，他在一篇讲演中，谈到当时欧洲的一些平民文学家之所以“从同情于平民”变为“平民的敌人”，基本的一条原因，就在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㉒。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倘若不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则“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对这种翻筋斗的人，鲁迅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觉，并时时引以为戒。他不仅忠告别人，自己也身体力行。他在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时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是黑暗，……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吧。”^㉓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当时正在同新军阀蒋介石作着艰苦卓绝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鲁迅不为名誉、金钱所动，面对黑暗，宁愿受穷，也不背叛革命、离开工农，去做专写“翰林文字”的御用文人。他的这种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绝不动摇的奋斗目标和鄙视资产阶级花花世界的高尚情操，正深深植根于他与党的革命事业和广大工农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鲁迅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㉔，始终把自己当成“大众中的一个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严于解剖自己，紧跟着工农群众的步伐前进，由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不仅以言论，而且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继续革命的光辉榜样。

鲁迅对“同路人”的论述，是他长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批判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同走资派进行长期、反复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一个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他从来没有接受党的最高纲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也根本没有在长期斗争中得到改造。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触动了他视为命根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既得利益，触动了他竭力维护的传统观念和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他同坚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就决定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抵触、反对，必然要跳出来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就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而言，是和历史上的“同路人”有共同之处的。但是，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的不同，邓小平一类走资派又有着新的特点，即他们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惯于运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特别是他们窃据着一部分政治、经济权力，能够强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革命的危害更为严重。因此，我们要特别警惕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充分认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走资派还在走**”将是一个长期的反复出现的

（下转54页）

们在学习鲁迅严于解剖自己的彻底革命精神，回顾没有改造好世界观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堕落为走资派的全过程的时候，重温毛主席关于“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重要教导，真是感到无限的英明，无限的亲切。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先生“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先生的著作，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当前，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失败了的阶级还会采取各种手段，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我们一定要学习鲁迅“永远进击”的彻底革命精神，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向邓小平、向垂死挣扎的阶级敌人勇猛进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上接59页）

历史现象，准备长期作战。同时，我们每个同志也要汲取“同路人”的历史教训，“学习鲁迅的榜样”，不断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坚持继续革命，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本文作者系成都市革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和成都市二轻局干部）

【注】

① 《上海文艺之一瞥》

② 《〈十月〉后记》

③⑧⑩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④⑤⑦⑧ 《忆刘半农君》

⑥ 《“感旧”以后（下）》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⑭ 《〈何典〉题记》

㉒ 《关于知识阶级》

㉓ 《致台静农》

㉔ 《〈二心集〉序言》